

反映美国汽车工业的艺术纪录

——评美国当代长篇小说《汽车城》

王秋荣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七〇年，美国发生了战后持续最长的第五次经济危机，华尔街的大小资本家象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万状，无可奈何地哀叹：美国进入了“困难的年代”，面临着“动乱的深渊”。这时，以写“社会问题小说”而著称的作家阿瑟·黑利，针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何去何从问题，及时创作了一部以汽车工业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汽车城》。^①这本书在一九七一年年底出版后，即被列入当年畅销书目之一，并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在欧美各国风靡一时，影响甚广。

阿瑟·黑利是加拿大人。一九二〇年四月生于英国的卢顿，一九四七年迁居加拿大，一九五二年正式成为加拿大公民。他先后在英国任空军驾驶员、空军上尉、伦敦办公室待役、职员、出版公司编辑、多伦多活动住宅公司推销部经理等职。一九五六年以后，为多伦多阿瑟·黑利有限公司业主和总经理。

阿瑟·黑利虽是加拿大人，但从五十年代以来，长期在美国居住，了解和熟悉美国社会生活。他在一九五六年起，正式从事专业创作。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手法，广泛地描绘当代美国社会动向和刻划形形色色的人物见长，在一定程度上逼真地暴露了美国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因而在美国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他的小说除《汽车城》外，还有描写美国医院实况的《最后的诊断》（1953），抨击美国官场丑闻的《身居要位》（1962），反映美国旅馆现状的《饭店》（1965），刻绘美国机场风波的《航空港》（1968），揭露美国金融界内幕的《钱商》（1975）等。此外，还写有很多电影剧本，如《零点》（1957）、《定时锁》（1958）、《年青的医生们》（1961）、《饭店》（1967）、《机场》（1970）等等。

阿瑟·黑利从事创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说：“每本长篇小说，通常总要花上我三年的时间：一年连续不断的调查，六个月的细节设计，接着便是一年半之久的认真的写作，包括反复修改。”^②据有的传记作者评述^③，他曾在汽车城底特律的福特和通用两家有名的汽车公司进行了为时将近一年的深入调查，在那里访问了从公司上层头头一直到装配工人的各色人物，详细翻阅了大量的内部材料，广泛接触了生产计划、车辆设计、汽车经销、零件制造、汽车广告等许多具体问题，随后又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进行构思、写作、修改乃至最后定

稿。由此可见，作者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写成的《汽车城》，决不是心血来潮，出之于一时的冲动，而是对美国汽车工业的深思熟虑的艺术纪录，对美国社会问题及时摄下的生动剪影。

如所周知，在美国，汽车工业被看作是三大经济支柱之一，是消费钢铁最多的工业部门，是美国工业的一面“镜子”。它的生产情况和美国整个工业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景气”与否，往往被看作是预示美国经济发展趋势的“风雨计”；它的陷入困境，必然导致美国许多工业部门产生连锁反应。据统计，美国每五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工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汽车工业。因此，抓住汽车工业的主题和题材，不仅便于剖析美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动态和趋势，而且可以窥察美国广大工人的生活 and 处境。

在《汽车城》中，阿瑟·黑利选择了一九六七年美国黑人工人大规模抗暴斗争爆发后的汽车城底特律为背景，围绕着“参星”汽车的设计、生产、销售的主要场景，展开了对本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社会生活的广泛描绘。其中，有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家汽车公司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资产阶级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唯利是图；资产阶级小姐、太太的灵魂空虚、偷情取乐；流氓集团的弱肉强食、相互火并；司法当局的为虎作伥、营私舞弊；劳动人民（特别是黑人工人）的备受迫害、痛苦挣扎……这一切，宛如纪录片电影镜头那样一幕幕地凸现在读者的眼前，使我们接触到了美国社会的真象。马克思曾说过：“必须区别任何一个作者在现实中提供的东西和他只在他自己的想象中提供的东西。”如果仅从“在现实生活中提供的东西”这一点来看，那末，《汽车城》的揭露作用是很明显的。作者通过形象的描绘，把“真实见闻供诸他的读者”^④，对于我们了解和剖析当今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分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

在《汽车城》中，主宰情节发展、贯穿全书始末的中心人物是通用汽车公司计划部经理亚当·特伦顿。在作者的笔下，他被描写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理想人物”，汽车界的“当代英雄”。他由出身于钢铁工人之家的“下层”人物，一跃而为汽车业方面的“上层”权威人士。请看：他办事“胸有成竹”，对工作“全力以赴”，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办公室里，对汽车业可谓“忠心耿耿”。他曾说：“汽车一向是跟我同呼吸共命运的。”为了设计、制造最新的产品“参星”，他兢兢业业，废寝忘食，把个人的一切，甚至包括夫妇之道，都置之脑后，因而引起了她妻子埃莉卡的不满，促使她走上了偷情撬窃的道路。他对美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前景，充满了信心，认为“虽有好多不对头的地方”，但“十之八九是对头的”，而且，一切都“正在迅速改变”，表现“在经营态度上，在对社会的责任上，在我们制造的那种汽车上，在跟政府的关系上，在消费者表示的谢意上，都看得出来”。因此，为了发展汽车业，开辟汽车工业的“全新的纪元”，他断然谢绝他的好友珀西为他安排的西海岸公司总经理的要职，决定在汽车界度过“工作的一生”。最后，他领导设计的“参星”汽车投产，畅销，并且进而规划设计更新的“远星”。总之，他样样满意，一切称心，感到“没有再比这个工作环境激动人心”的了。终于，他情不自禁地呼唤：“我投了底特律一票”。

应该指出，这“一票”是亚当“投”的，更是《汽车城》的作者“投”的；而且“投”的不仅是“底特律的一票”，而是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票”。显然，在亚当的形象中，倾注了作者的希望和理想，他的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坚强的事业心，也不乏可以效法之处；殊

不知，即使人人都象亚当那样，也并不能主宰汽车工业发展的前途，挽救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没落的厄运。

在小说中，作为亚当形象的补充，则是才华横溢的青年设计师布雷特·迪洛桑多。此人与亚当不同，具有“清醒的头脑”，“领导的才能”。作者虽没有直接描写布雷特的政治生涯，却处处把他当作政治人物来刻划的。小说通过他与公司人事处黑人处长温盖特、纽约广告公司底特律办事处职员巴巴拉等人的关系和活动，写出了他象救世主那样关心黑人工人的生活，“内城大部分地区普遍流行的病痛与贫困”，“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面对着黑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捆住了手脚，动弹不得”的现状，他一方面指责汽车商对他们所处的社会“没有半点规划，也没有丝毫贡献”，一方面想对这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所以会掀起暴动的环境来个“彻底改善”，提出“要在圈外工作”。什么是“圈外工作”呢？且看下面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你要是去搞政治，我也不觉得奇怪，”亚当说。“我但愿你知道，你要是去搞政治，我不但会投你一票，而且还会出钱帮你竞选。”

温盖特说：“我也一样。”

“他打算干的一件事”，巴巴拉告诉其他几个人说，“就是画画。”

很明显，布雷特的“圈外工作”，就是去搞政治改革。而这种“改革”，亚当不仅赞同，而且大力支持：投一票，还“出钱”帮“竞选”。因此，在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方面，亚当和布雷特不消说是“志同道合”了，即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一根毫毛的前提下，画一幅慰抚黑人，调整阶级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补天”的政治设计画来，使黑人工人接受资本主义的“改造”，以解决动乱不安的社会政治危机。这样，亚当的“事业”岂不是更有保障了？巴巴拉所说的“画画”，实际上就有这个意思。列宁早就指出：“现在，无论在英国和美国，都可以摧毁、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要知道，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即使布雷特有生花妙笔，也是画不出这幅画来的。当然，作者没有，也不可能看到这一点。

亚当和布雷特，一个从事生产安排，一个进行政治革新。作者认为，只要依靠象亚当和布雷特那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萧条冷落的汽车工业就能日益振兴，病人膏肓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起死回生，“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倒塌了”，“金元帝国”就能转危为安，重新回到“代表了梦想、雄心、人类的成就”的繁荣时代去。

正因为如此，小说通过亚当和布雷特等人之口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一句话：“丑的就是美的。”一次，亚当和布雷特从月球飞船座舱的“丑”，谈到了爬滩车的“丑”：边边角角，东凹西凸，奇形怪状，不平衡，不对称，没有几条整齐的曲线，的确丑，丑极了。但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制造出来有目的，也达到了目的”，“战胜了丑，结果就出现了本身的美”。据此，他们提出：“为什么不审慎、不大胆尝试一下，设法生产一种汽车，照目前的一套标准衡量起来，虽然是丑的，可是完全适合需要、适合社会环境、适合目前的时代——实用时代，就此变成美的呢？”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亚当着手了“远星”的设计。“应该多讲实用主义”，这原是亚当一贯的主张。什么是“实用主义”呢？说穿了，就是使垄断资产阶级有利可图，就是让他们能够贪得无厌地吮工人的血汗，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获得超额利润。明明是假的，如果对他们有利，就偏偏说成是真的；清清楚楚是恶的，只要对他们“实惠”的，也就是善的了；的的确确是丑的，如果对他们有“实用”价值，也就是最

美的了。他们制造的汽车，生产的一切，唯一的目地，就是为了赚钱，获大利；而一旦达到了这一目的，那么，“在丑中看出了美”，“美”战胜了“丑”，最“丑”的也就成为最“美”的了

这里，作者并非在开什么玩笑，也决不是说家常，讲艺术，谈哲理，而是在论政治，指方向，开药方。当今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就象“丑陋的狗崽子”般的“爬滩车”，“丑八怪”的“远星”那样，尽管目前是乱七八糟，千疮百孔，黑暗腐朽，但小说标明，只要有亚当、布雷特那样有抱负的人物，“激起灵感”，进行改革，掌握车轮的前进轨道，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变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蒸蒸日上。“战胜了丑，结果就现出了本身的美”，正象布雷特能把一堆“五花八门的破烂画活”，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来一样。这就是阿瑟·黑利在《汽车城》中给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开出的一帖“灵丹妙药”，给“未来的日子”构思的一幅美满图景，给时代的车轮开辟的一条发展道路。

不错，“丑”可以转化为“美”，但决非亚当、布雷特等人的拼拼凑凑，修修补补，就可以奏效的；而只有掀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狂风暴雨，推翻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才能达到。这说明作者未能从本质上认识美国社会的罪恶根源，“他自己的想象中提供的东西”，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那一套行不通的过时货。

三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在社会生产中则表现为各个个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上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生产，包括汽车制造业在内，都是在这个矛盾中运动着。日益发展的社会化的大生产，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生产服从于资本家的私欲。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拼命扩大再生产，而全然不顾他们自己企业生产的商品是否适合社会的真正需要，是否在市场上销售得出去。正如斯大林所指出：“为了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并榨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得不发展技术，实行合理化，加紧剥削工人，并且把自己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最大限度。为了不落后于他人，所有资本家都无论如何不得不上这条拼命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在这方面，《汽车城》作了生动的描绘和具体的反映。就以小说中所提到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家大型汽车公司来说，彼此追新逐异，相互争斗，不断制造千奇百怪的新产品来刺激市场，招徕顾客，击败对手。他们还雇用密探，盗窃对方的经济情报和新产品的技术资料，或干脆用高价收买对方公司的技术人员。他们为了推销汽车，要弄各种肮脏卑鄙的手法，在经售商行中，施展出“最古老的把戏”，登广告，排酒宴，演戏剧，拍电影，骗顾客，诱买主，甚至不管赛车手的死活，利用赛车作为推销本公司汽车的一种特殊广告。无怪乎亚当的妻子埃莉卡有一次埋怨起来：“这些人活着，光是为了汽车，为了销路，为了锦标”，而“把其他一切都忘了”；也无怪那个头号汽车评论家维尔指责“汽车工业三大公司犯下了‘贪婪、罪恶阴谋和任意利用公众信任以谋私利’的罪”；更无怪乎黑人人处处长温盖特向着漆黑的夜空呼天抢地的叫喊：底特律是一个“没有心肝的城市”！其实，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岂止是底特律而已！今天，从佛罗里达到阿拉斯加，从太平洋沿岸到大西洋之滨，美国大小六千多城市，无一不象底特律；行行业业，情况并不比汽车业为

妙。在这一意义上讲，作者笔下的“汽车城”底特律，到是具有深刻的典型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在竞争中不择手段地扩大再生产的同时，直接受害的却是工人和农民。他们遭受着更加残酷的剥削，生活日益贫困，购买力不断缩小，使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生产水平和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化，产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尽管以亚当为代表的汽车界人士，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竭力设计、赶制最时髦的“参星”、“远星”等新产品，又何尝能在市场上如数倾销呢？表面繁荣的假象掩盖着内在的霉烂，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美国汽车工业和其他工业不会有更美好的前景。作者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显然未能看到这一严重的问题。

应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垄断资产阶级每一种新产品的的设计、制造，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意味着对工人阶级多一种榨取、加一分重负。垄断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正是工人贫困的积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是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却总是被资本家竭力保持在最低限度范围内。”（《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4页）这表现为：一方面是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拥有一切生产资料，过着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另一方面是广大工人和劳动群众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对此，小说作了如实的揭露：“一道看不见的鸿沟，把这个世界分隔开来，一边是象罗利·奈特那样‘一无所有、素来不名一文的’穷人，一边是‘万贯家私的’阔佬。”请看：黑人工人罗利·奈特住的是散发着“一股垃圾臭味”的斗室，家里只有“一只破旧的煤气灶和几个简陋的木板架子”，而一个小小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汉克·克劳泽尔，就拥有一座华丽的别墅，起居室陈设豪华、雅致，各种高级的起居什物，完美齐备，应有尽有。贫富悬殊，对照鲜明。此情此景，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亚当之流，当然是无动于衷的，他得意洋洋地说：“越是自动化，人手越少，每个人的工作量就越高。”果真是这样吗？这未免设想得太美妙了！仅就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来说，上有工头领班的严密监视，身受苛刻的规章制度的管压，就象“囚犯”在“牢房里”一样，被编着号码的，干着单调、繁重而紧张的工作，连气都喘不过来。为了勉强支撑下去，干一天活，大多数工人不得不吸大麻等毒品，饮鸩止渴。可见，车轮每滚动一步，工人们要化多大的代价。黑暗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不知活活葬送了多少无辜的牺牲者，资产阶级也正是在工人累累白骨的基础上，建筑起了他们荒淫无耻的“人间乐园”。作者出于同情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义愤，在小说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就在这个自由社会里，有的人一生下来，简直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这正好戳穿了‘人人生而平等’（见美国《独立宣言》——笔者）那个陈词滥调。”千千万万象罗利那样的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四下里有的只是贫困、不平等、寥寥无几的机会”，“有待决定的，无非是究竟倒霉失意到什么地步而已”。应该说，这是全书的动人篇章。

四

历史证明：“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1882年1月25、31日》）经济危机往往是政治危机的先导，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伴随而来的是革命因素的增长，劳动人民新的斗争高潮的出现。正如马克思在《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所预言的那样：“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在美国二千

多万工人中，有六百万是黑人工人；在美国的汽车工业中，将近一半以上的工人是黑人。在“汽车城”底特律，黑人工人则尤为集中。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中指出：“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美国黑人革命斗争的浪潮，此起彼伏，遍及全国。这里既有“汽车城”底特律，也有美国的心脏华盛顿。例如，一九六七年，有一次底特律黑人为抗议警察无理抓人，成千上万的黑人群众拿起武器，同数万名法西斯军警进行英勇斗争，在全市先后点燃起了一千三百多起斗争烈火。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晚，在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以后，美国广大黑人立即掀起了空前的抗暴斗争风暴，几天之内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在向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进攻的新的号角声中，黑人工人摒弃了“非暴力主义”，不分种族，同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紧密配合，并肩战斗，跟荷枪实弹的军警搏斗，捣毁一家又一家的剥削者的商店和当铺，燃起一团又一团的复仇烈火，卷起了波澜壮阔的斗争怒潮，汇成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有力地冲击着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汽车城》虽以一九六七年以来的黑人抗暴斗争为背景，但没有给予应有的正面反映，仅仅在讲到困难户招雇计划时，侧面提及这个“所谓困难户招雇计划，是在底特律暴动以后开始的”。作者写道：“汽车公司当然自我标榜，说这么做是为他人谋福利；……宣传部职员也就宣传他们老板热心公益的精神了。比较爱挖苦的观察家却称汽车界着慌了，只怕动荡不安的社会对他们企业有所影响。另外一些人预言，但等一九六七年这座暴动纷起、火光熊熊的城市冒出的浓烟，蔓延到了通用汽车公司大楼（事实确是如此），火焰逼近过来了，某种形式的公益事业就有了保证。这个预言果然应验了，只不过首先行动的是福特汽车公司罢了。”

由于作者未能充分认识底特律汽车工人当时轰轰烈烈的罢工、抗暴的必然性及其深刻的革命意义，相反地却把汽车的滞销，经济的危机，底特律的混乱，社会的不安，诉之于种族的隔阂，归咎于工人的捣乱，在客观上用种族矛盾掩盖了针锋相对的阶级矛盾，用工人之间的相互捉弄来代替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翻开小说一看，作者首先就把黑人工人纽柯克和领班帕克兰德的一场斗争，写成是黑人和白人的一次口角，把资本家走卒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和肆意凌辱说成是“说漏了嘴”而已。再以前面所提到的小说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黑人工人罗利来说，他的口头禅就是“臭白佬”，他缺乏鲜明的阶级观点，憎恨所有的白人；尽管作者多次通过他的口大骂“整个茫茫世界里只有狗屁罢了”，实际上他根本不认识自己身受的遭遇来自一小撮垄断统治阶级，他只是个没有丝毫政治觉悟和对生活完全绝望的人。甚至，他为了报私仇，泄私愤，竟然想方设法把一个工人的手让机器砸烂。至于其他黑人工人，如大个子鲁夫，勒鲁瓦·科尔法克斯，老爹莱斯特等，一一被写作是黑人“黑手党”的党徒，贩毒、开赌、盗窃、抢劫、行凶、杀人，样样都干，无恶不作。这是对黑人工人形象的极大歪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把他们个个写成为十足的流氓、恶棍，没有半点工人气息的基础上，又利用种族矛盾在他们的“事业”上涂抹一层薄薄的“正义”油彩，这样，就把非正义的暴力和正义的暴力相提并论，混淆起来，从而否定革命暴力，为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很清楚，在小说中作者反对什么，提倡什么，也就昭然若揭了。

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

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在强大的黑人抗暴斗争面前，美国反动统治阶级采用了政治欺骗和军事镇压的两手，他们在派反动军警进行直接镇压的同时，叫嚷什么“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等等谎言，以愚弄国内人民，麻痹黑人斗志。在小说《汽车城》里，作者也不是满怀同情地描写了底特律实行“某种形式的公益事业”，即前面所提到的所谓“困难户招雇计划”吗？黑人欠了债，汽车公司不是在尽力替他们设法解决吗？而一些上层人物，包括亚当、布雷特在内，更是对罗利投以同情的目光而“关怀备至”吗？似乎抱种族歧视的不是白人中的资产阶级，而恰恰是象罗利那样的“黑人种族主义者”。作者借巴巴拉之口不胜感慨地说：“以怨报怨，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妄图以此调和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矛盾，来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但是《汽车城》的作者由于资产阶级的偏见，哪里知道罗利的弟兄们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中所表明的却是这样一个真理：斗争，革命，打倒万恶的资本主义，消灭一切寄生虫！时代的车轮按照历史的轨道滚滚向前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革命的烈火遵从人民的意志熊熊燃烧，是谁也扑灭不了的！有人说：“在小说里，在隆隆的车轮声中，隐隐约约夹杂着雷声，抗暴斗争的雷声，狂风暴雨前的雷声。”^⑤事实上，作者并没有能够写出这种“雷声”，恰恰相反，倒是听而不闻，并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幕纱掩盖了时时从现实生活中迸发出来的“雷声”。

综上所述，阿瑟·黑利从现实生活出发，象一个目击者那样，讲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比较真实地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种种丑恶现象，其中，结合人物描写和情节开展穿插了许多关于汽车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但他无力解决矛盾，相反开出了错误的药方。当《汽车城》出版之际，有个名叫约翰·黑德的评论家及时写了一篇书评，认为“《汽车城》对汽车工业既是揭露又是颂赞”^⑥。其实，作者在小说中“颂赞”的方面，正是我们需要加以批判的。尽管这样，《汽车城》仍不失为反映美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值得参阅的小说。

注：

① 此书由我院中文系朱雯教授、李金波副教授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0月初版，内部发行，书名为《车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5月再版，公开发行，书名改为《汽车城》。

② 见詹姆斯·维恩森编：《当代小说家》，伦敦圣詹姆斯印刷公司1972年版。

③ 见《当代传记》第33卷第2期，1972年2月版。

④ 见詹姆斯·维恩森：《当代小说家》，伦敦圣詹姆斯印刷公司1272版。

⑤ 山珊：《〈车轮〉小引》，《车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0月版。

⑥ 见1971年9月19日《纽约时报·图书评论》。

